

何建明《大桥》:

一曲气壮山河的中国精神正气歌

□郝振省

何建明倾力书写的展现港珠澳大桥建设历程的新作《大桥》终于出版了,真是令人兴奋。与建明同志《忠诚与背叛》的党性深度挖掘相比较,与《南京大屠杀》的十问国人慷慨激昂相比较,与《这山,那山》对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精准诠释相比较,与《浦东史诗》波澜壮阔的改革场景相比较,我以为《大桥》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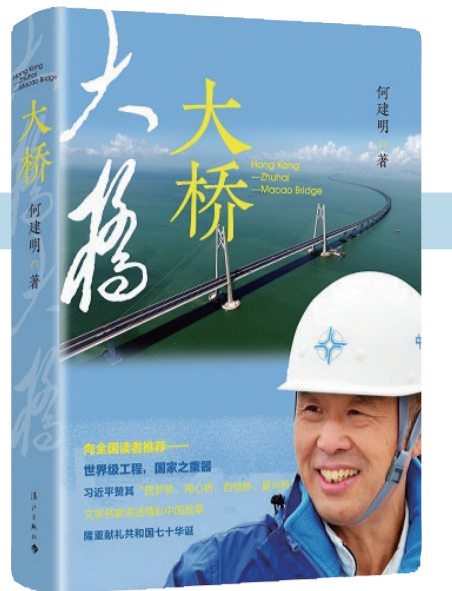
第一,这既是一部关于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的物质的、物理的、惊心动魄的宏观建设过程之描写,报告文学之佳作,更是一部关于以林鸣总工程师为代表的建设港珠澳大桥的中国工程专家群体与中国现代工人群众精神的、心理的、思维过程的深度发掘、精准扫描与深刻记述。工程伊始,林鸣他们开始虔诚求教国外相关行业最优秀公司的经验,结果呢,还不说沉管制造的高端技术,只是沉管安装工序的咨询指导费用,对方就开出了1.5亿欧元(大约相当于十几亿人民币)的价格,并宣称:我方给出的3亿元人民币,只够吃一首祈祷歌的费用。而且为了实现对港珠澳大桥沉管安装的技术垄断,别人把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做到了家门,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进行了全部注册。正是这一绝地相逢,促使林鸣和他的中国工程师团队走上了一条“绝地求生,突破封杀”,“气吞山河,义无反顾”的创新之路。在他们头脑里,浸润着爱国名将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抗击鸦片战争的中国人的生命基因。人工岛的“定海神针”——18层楼高的大钢圆筒的制造与安装,每一个环节都有若干难以逾越、无从下手的难题。每一个要命难题的攻克

都常常意味着对人类原有思维界限、意志界限的超越与突破。有人形容这项工程是“千人走钢丝”,实乃真实写照。其中,包括记录与描述了林鸣总工程师对毛泽东著作的特别喜爱,对毛泽东战略战术智慧的推崇与娴熟运用,以及喜爱和推崇的原因:每一次全军失望痛苦至极之时,毛主席总能高瞻远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从而让困难化为乌有。林鸣说,“大工程的设计与实际施工间的差异性,则有可能是颠覆性的。”“面对大海,我们的未知数更大了,因为施工技术与大海环境这双重的未知,叠加的未知,会让人产生恐惧感。”这是特别需要毅力和意志的。应该说林鸣总工程师和他的团队与超级大桥工程相伴而产生,相融合而成长,他们合奏了一首气壮山河的中国精神正气歌。大桥的落成是中国智慧的最充分的展现与运作,是中国道路最生动的诠释和解说,是中国理论最有力的验证与传播,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实践与成果。

第二,这既是一部充满激情、气势磅礴的报告文学佳作,又是一部关于港珠澳大桥建设,乃至世界最新超大桥梁的工程建设的报告文学,有很强且密集的科技含量,是借助文学笔法展现科技含量,也是何建明报告文学的新拓展。随着对《大桥》各个章节阅读的不断深入,我们看到了大桥的总指挥、总工程师和他的精锐技术团队,不断超常规的攻坚克难的一次又一次战役,不断超常规的跨越一次又一次“几乎过不去的坎”,不断从“走投无路”中实现伟大创造。从而也使我们获得一系列崭新的创新科技知识:岛隧工程,沉管安装,十五级台风“山竹”的超级原

子弹当量,关于超难度人工岛的比较精准的描述与介绍,18层楼高的大钢圆筒筑岛方案的选择,副格作用的刻画与其物理形状的定格,副格制造基地的选择,液压振动锤的系统描述介绍,建立人工岛沉降计算机模型,关于沉管群岛的重要数据及总体描述(沉管实际上是海底公路,是密封的海底公路隧道)。还有刚性沉管与柔性沉管的选择之难,从而有半刚性(半柔性)沉管的技术创造;沉管“出嫁”的一系列极苛刻条件与类似航天器发射窗口的确认与定盘,33节沉管入海安装,每一项都是揪心扯肺的心动魄检阅,关于对水基钢筋切割液的选择与现场把控的技术追求,令人叹为观止。自主创造的庞然大物钢铁巨爪,其实是“海底世界第一绣花针”,海底基槽吸尘器的设计或发明与交流流动性混凝土原理的制造工艺的压榨性成功,沉管最终接头的对接成功,绝对是一种残酷的艺术。正像大桥建设者把巨大工程当作山穷水尽的艺术创造一样,在何建明笔下,每一次大桥建设中似乎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都成为中国工程专家和中国工人团队展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动人魂魄场景,与此相伴随的一系列令人望而生畏的数据,变成了作家得心应手打动读者心灵的工具。这本书甚至可作为大桥工程学的辅助教材或入门教材。

第三,这既是一部记述描绘港珠澳大桥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的佳作,又体现大桥工程建设团队对经济效益的孜孜追求与精打细算。既会计算,又会算计。且不说港珠澳大桥一开始设计就有地理地缘交通便利天堑变通途方面的目标,同时也有重要的经



济利益、经济效率方面的考虑。比如从深圳到香港每个集装箱的运费是1000港币,但如果从珠海走陆路须绕道广州,每个集装箱的运费则为3000港币。在和国际上最著名的荷兰公司的沉管技术咨询费谈判中,3亿元人民币的中方底线与对方1.5亿欧元的价格底线之差异,成为谈判中断的主要原因。也正是挑战这种差异,林鸣总指挥和他的团队被逼上了一条科学的博弈之路,放弃盾构隧道,选择沉管隧道的确有节省1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预算考虑。放弃DOKA公司沉管模板,选择PERI公司的新模板,除了瘦身近一半的工程效益,还有省出1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益。另外,对普茨迈斯特外国公司皮带输送质量问题的追究,挽回了至少4000万元人民币的损失。这表明经过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刷,经过国际市场的风雨历练,中国工程专家、中国工人群众,变得更精明了。

《大桥》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故事结构都十分精彩,是当代文学的又一重要收获。我们期待何建明下一部国家“大桥”式作品的诞生,因为国家需要这样的作家来书写精彩的中国故事。

丁捷《约定》:

文学初心的应许之地

□李释隐

作家丁捷曾是一名援疆干部,同时也是一个伊犁河畔的“行吟诗人”,他把最深情最执著的诗篇献给了伊犁,同时用自己坚实的足迹,承接往昔理想主义的流风余绪,续写着最美丽的新疆篇章。

“新疆是壮阔的、崎岖的、无极的、神秘的。新疆是丰饶的、浓情的、灿烂的、莫测的。新疆是凝固的画、流动的歌、传诵的诗……”长河大漠,天山绵延,驰马游牧,瓜果飘香。文化援疆的三年,是丁捷作家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人生财富;与援友们并肩工作的点点滴滴,也都成为他最美好的记忆。

不过,《约定》一书显然不是一个关于伊犁独特民族风景的展示,尽管这个地方隐藏着太多的宝藏——山川风物、民俗世情、流年人物等等,还有由于时代变异和文化迁移而演绎出来的故事。尽管本书与伊犁的文化气质也颇为相符,但是,毕竟传奇旅程、民族情调、大美风景以及种种西域的天方夜谭,并不是丁捷关注的焦点。

在《约定》一书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猎奇,没有什么奇闻轶事,全书充满了人情物意之美,充满观察与投入,弥漫着情意和光辉。这就是丁捷,他能和那一匹偶遇的小白马进行长达半小时的目光交流,那样的画面即便不是观者,想来也是极为动容的。对望之间,一眼便是千年。

丁捷的才情是洒脱自如的,文字也已是一派洗尽铅华的格调。在他笔下,朝夕相处的援友、热情挥洒的当地艺术家、当地风风火火的女官员,甚至是路遇的一位哈萨克族大嫂,就像草原星光下一幅幅优美的剪影,简洁而又令人难忘。牧区小学的老师热斯古丽、哈萨克族小姑娘麦丽娜、努力工作的古丽努尔,还有汉族女孩李英等,一张张美丽的肖像,经常会让人内心莫名地有所触动,并且余音袅袅。在一种宁静的光辉里,在这片被时间和记忆浸透的山水间,丁捷将一个寻常的人物镌刻下来,呈现着一种舒缓悠远的美感,有风光也有内蕴,历史感和现实感相互映衬,苍凉深邃的历史与浓郁的风土人情交织在一起,让人倍感诗意而又感慨万千。

但丁捷显然并未满足于于此,他心思渺远,已不知飘向何处。“一个人的身体能走多远?世界有没有边?”

丁捷总在追问自己,他认定,没有人能走得过世界,有限的生命终究要被无限的世界所抛弃,这是一个人活着就可以看到的现实,而且是步步逼近的。那么,有没有一个东西,是无边无际的,是同时融入你的身体和你的世界里的?

一位青海的诗人昌耀曾经说过:“‘西部’,不只是一种文学主题,更是一种文学气质、文学风格。”丁捷在美丽的新疆伊犁河谷,吟咏遥望,沉思默察,《约定》就是融合边疆大地壮丽风光、人文地理与现实脉动的结晶。作品以人文地理的视域观照自然,其中又渗透了人的情致。它将文化和史地融为一体,使其在不经意间,拥有了一种温暖、纵深、绵长而细腻的文体性质,带人回到最原初的文学和感动本身。

援疆结束后,丁捷回到了第二故乡南京,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却止不住长久的牵挂和思念。他怀想着美丽的赛里木湖,天和水蓝成一片的湖泊,洁白的云层和羊群,毡房里一阵阵欢声笑语,浓烈的奶茶的甜味四处飘逸,这样的场景早已熟稔于心,渐渐凝结成一种化不开、剪不断的“乡愁”。

几年后,当他再次有机会重访伊犁时,他走上了喀拉峻草原。“世界陷入了沉静的壮美。我在草海和花丛中,站了好长时间,不知所措。一个人被如此博大的美包围着,独享这大自然的盛感,真的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不知所措”,这四个字用得真好。对于天地大美,乖乖束手,甘心被掳魂而去的诗人,新疆用奢华无比的奖赏,补偿了他多年的用心和付出的辛劳,让一切成为心灵永恒磨灭的典藏,让诗人重新变为恬静安然的赤子,高卧在如花如玉的原野。

在丁捷此后10年间的作品中,我们也都看到他写作题材、风格、气脉的重大改变,我个人认为,援疆经历带给他的改变是不容忽略的。旷远的风景,大地和阳光的滋养,令人沉醉的风物世情,使他变得更加沉潜,也更加谦卑。他更加懂得感恩,更能领会朴素与简单的要义,这些无不使他的创作得以升华。

《约定》当下性视角,切实完整地书写了新时期新时代的新疆经验,是一种关于新疆当代生活极富质感的诗意叙事。在丁捷30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约定》占有一个特殊的承上启下的位置,一方面它内在地承接了青春题材小说《依偎》等的纯净、伤恹、浪漫之余绪,到后期反腐作品《追问》《撕裂》等对人性深层的勇敢探索,再到《初心》的沉静与阔大,这部位于中段的、以援疆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对于作者本人而言,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着重大而内在的影响。《约定》不仅是丁捷与伊犁的“约定”,不仅是作者与读者的约定,更是与自己心灵的约定。因为《约定》,丁捷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蜕变,接获了中国边地文化与人文地理的一份独特元气,成就了精神的升华。

抉发知青一代的神魄和心魂

重读蒋巍知青报告文学

□刘金祥

蒋巍知青题材的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文学画廊里无疑是一幅奇谲俊逸的景观,追踪和抉发其知青文学创作轨迹和实绩,不难发现其作品涵纳着为评论界所忽略的社会学意蕴。

尽管近年来知青文学整体上已呈偃旗息鼓之势,蒋巍自身文学创作也“转战”到其他领域,但其笔下的知青命运依然是一个意味丰饶的现实话题。当下是历史的延传,未来是现实的承续,知青本体所包蕴的历史内涵和社会价值,只有以一种特定时空意识加以透析才能廓解和释放。蒋巍多年前撰写的一组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十周年祭”为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以知青下乡垦荒和戍守边疆为历史背景,以知青的生存状态和现实行为为叙述轴脉,在历史和现实双向维度上实录和呈现诸多知青的情感演化和价值涅槃,实现了对知青“苦难风流”形象的摹绘和体认,完成了对一代人心灵蜕变的审美塑造和理性界定。在蒋巍创作知青报告文学之前,许多知青文学作品流露着自怨自艾的悲悯格调。在这些作品中,癫狂的年代燃起了知青的燥热与盲动,虚伪的年代孕育了知青的困惑与迷失,知青们无奈地舔舐岁月留下的伤口,用体力和脑力换取最低的生活补偿,压抑多于弘张,无为胜过有为。而蒋巍知青题材作品潜蕴着一种积极而理性的价值判断,不仅提及起一代人的神魄和心魂,勾勒出“格式塔”式社会心理在知青人生坐标系上的沉浮起落:压抑后的复起,失落后的再生。在《银河,有一颗新星》《我回自己一千次》《蓦然回首》《幽幽的小阁楼》和《生活本该是另一种》等作品中,蒋巍将知青行为中的裂变转化为内在价值的迁转,把历史时空情景转换为社会心理范畴,所叙写的主人公被运动狂潮裹挟到广阔农村边地,沉重的精神锁链挤压着知青们的心性,然而历史正是在无数偶然中为自己的必然走势开拓出新路。一代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历史,而历史却已提早为一代人安排好席位,于是就有了《梦里青纱帐》集体大返城的自发行动,物质匮乏、精神贫饥和心理阵痛最终幻化为知青放弃屯垦边疆的原动力。蒋巍一方面从人性角度否定和批判曾使一代人付出沉重代价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则以更大的激情和热情褒扬知青在动乱年代中苦修而来的精神收获。《银河,有一颗新星》中的方始春、《梦里青纱帐》中的王玉臣、《在人生的座标系上》中的刘晓程、《生活应该是另一种》中的柳荷等,虽然饱食“苦果”和沦为“孽种”长达10年,但错乱时代和迷乱岁月成就了方始春、王玉臣、刘晓程、柳荷们的“无悔青春”和“苦难风流”。英国思想家培根针对反生式微的中世纪贵族阶层说过这样一句话:“失落感意味着回归与再生,而大的创造,总是诞生在一个失落感极强的群体中”。这句话对于英国中世纪昏聩庸邦的贵族也许无甚启发和警醒意义,但对于蒋巍笔下的主人公则不失为失落后再生的理论诠释。对驳杂迷离形势的分辨判断力,对困苦挫折的忍耐承受力,对瞬息万变的外界环境的顺应改造力等,无一不是那个特殊年代的馈赠,而这些又是他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当方始春、王玉臣、刘晓程、柳荷们以杰出企业家、优秀知识分子、卓越医务工作者和事业女强人腾跃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时,我们必须承认知青“持有在任何时间段复苏与生长的能力”(秦晓鹰语)。蒋巍知青文学作品以对历史的异化与反异化、人性扭曲与反人性扭曲的深刻揭示,获得厚重的艺术品位和殊异的社会学价值。

蒋巍知青文学作品虽不具全景式和宏观性,大都属于微雕纤琢,但在细致繁密中透出一种沉重和真切。他笔下的知青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一代人的缩影,主人公们树皮一样经剥裂地地生长,树根一样曲折蜿蜒地埋入泥土,无花果一样不见鲜花就默默结着果实;他们每个人几乎都与共和国历史重叠,40多年沧海桑田的变化,储存在他们的心灵上、凝结在肌肤里,新旧体制在他们心灵里交替演变,最终幻化为盘山绕海的路阶,任后来人踏肩而去。在蒋巍全部知青作品中最能体现这种悖论性主题的当属《梦里青纱帐》,这篇刊载于《文汇月刊》1990年第6期的报告文学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文中主人公王玉臣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知青人物,“知青情结”在王玉臣身上体现得完整而具体。为响应号召王玉臣虔诚地加入知青队伍,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虽历尽艰辛苦痛几经悲欢离合,但岁月却赋予王玉臣良善心性、健全人格和超众才干。当返城演变为知青的一种集体行为时,王玉臣毅然与上海籍妻子和牙牙学语的女儿洒泪挥别,抱定凤凰,扎根农村,献身边疆,至死不悔。蒋巍在这里展示给读者的虽然是王玉臣宗教徒般的信念和近乎愚钝莽撞的行为,但却从一个更深层面上凸现出知青一代悲壮的精神苦旅,促使王玉臣留在农村的绝不是愚钝和盲从,而是他和农民和黑土地结下的相濡以沫、割舍不断的感情,是自己寻求生存空间、实现生存价值的最佳选择。王玉臣离不开自己的事业,离不开淳朴的农民以及亟需知识启蒙的农民子弟。在一个尊重人性、尊重知识的政治环境里,人的价值体现和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受城乡地域的局限,作者为王玉臣卓尔不群的壮举而感发的“离去的并非懦夫,留下的定是强者”的慨叹,无疑寄寓着对知青心魂的深透理解和由衷感佩。把经受的全部痛苦磨难转化成助推社会进步的能量和力量,从人性淡漠的负面过渡到人性觉醒的阳坡,这就是蒋巍笔下知青人物身上的思想特征和精神特质,它为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坚韧不屈的传统美德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篇内涵丰厚、锐意出新的力作

□石 英

不久前,耳闻厉彦林有新作《城市》问世,近日终于有幸读到了这篇堪称力作的散文。

不少人都知道,前几年彦林的乡情系列散文接踵发表和出版后获得很大反响。这不足为怪,彦林生于沂蒙山区,长于斯,劳作于斯,他深爱那片土地,对那里的亲人和广大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感情。长期的体验与历练使它具有十分丰厚的生活积淀,一旦喷发,必成佳作,可谓得心应手。生活与艺术相融,长于提炼必当臻于上乘。

尔今他又另辟蹊径,转向另一大的命题——城市。作者毕竟在城市也生活工作了三四十年,虽不似在农村有“童功”的原生熏陶,但彦林是一位到了哪里必能融入而且从思想上扎下深根的“垦荒者”。使命与责任促使他去熟悉原来不熟悉的领域,探索那些对自己也许还是全新的东西,并力求掌握以更好地服务于党和人民的需要。尤其是当时代呼唤,形势所需,更触发了他开掘新领域的敏感。作为一位有担当有实力的作家,他历来不回避难题,总是从难从严,在新时代的开山岩壁上磨砺文笔的锋刃,《城市》一文的完成问世就是他一贯思想风格的又一次实践。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面对“城市”这样一个大课题,肯定向他提出了非同寻常的要求。但当他细读了全文之后,我觉得他以足够的力度驾驭了这个不易驾驭的大题材。看来他很明白:既不能弄成大而空,又不能搞成琐而小。于是他牢牢抓住大处着眼、细处运笔这个自悟的要领,开闸时如广原纵马,精要处又能见缝插针。作者正视时代的大趋势,“乡土中国”正向“城乡中国”跨越,城市步入黄金时代、流金岁月。“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态,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和成熟的物化标志”。于是,作者倾力试图诠释这些概念中包含的一切。为此他不吝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图画,运用了“点睛”般的细节,如:“在一些城市郊区,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景象:远处是耸立的摩天大厦和厂房,近处是农民戴着草帽在打理庄稼和菜园;头顶上是高架桥,路下是水塘、穿着裤衩的汉子和光屁股的孩子正在河里洗澡……”

如果我们细心阅读的话,将不难看出作者在采撷与组合“材质”上的匠心。无疑,直接的敏锐观察、采访和考察构成丰厚的基础,而间接地阅读所获也补益为不竭的底蕴。从文字里行即可透出他在这方面的勤勉与精致。他不放过每一个有助于构建这一颇具规模的大工程所需的材质,甚至连去新疆干干脆便观察与考察喀什老城时也得到相关的启发,从而收到了举一反三之效。还有,他回乡时从本村婚嫁嫁娶的走势变迁中也能悟到农村与城市人口进出及男女年龄段中反映出的实际问题。

不能不稍多费些笔墨说说本文的语言风格。总的说来,作者还是继承了他在乡情系列散文写作中形成的那种得心应手的文字表达,但由于城市毕竟不完全同于乡村那样的环境和氛围,采取的语言表达方式与具体格调自然应有适当的调整,也就是它的适应性。我在前面曾经说过,这种自然的调整和某些改变事实上已增加了难度。譬如:在说理方面,它当然不同于一般论文那样的论理方式,但仍含有说理的成分。好在彦林长于在不急不慢中娓娓道来,在这娓娓道来中已将他要表达的真理传达出来,因为作品的意图要求这样,传达不出正道理真道理,文章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这不能不说,对作者驾驭文字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达到了力所能及的程度,全文体现出一种从容不迫、亦庄亦谐的格调,将叙事、说理乃至适度的言情融会得比较协调,读起来使人感到舒服。一个“引子”,一开头就落笔不俗:“人类文明根须,大头扎根在农村,小头延伸进城市,繁茂稠密的枝叶,一半庇护农村,一半遮掩城市。”叙事则简洁温柔,注重色彩而忌浮艳。行为中有规范而不刻板地依循常规,如词序的合理变换,通感的适度运用,皆可收到新颖、韵味而不腻烦之功效。所以这里我感到了彦林坚实的诗质功底。究其实,任何题材的语言表达文字运用,从本质上都离不开诗。不在于表面上是否以诗的形式,而在于它内质的凝练、变通乃至不俗的美感。反之,如果缺了诗质这个东西,更不必说是一无所有,就很难可能造成苍白、干瘪、乏味的感觉。就连戏剧也是这样,有的经典唱腔乃至道白,之所以百听不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内中深含的韵味,耐得咀嚼,别具一种美感。彦林在他的乡情系列散文中,语言文字的韵味是很大的优势,《城市》运用体现起来应该说较有难度,但他仍然做的不错。可以说,是他词基甚底,可谓功莫大焉。而哲思则在他的生活历练中,阅读启悟中,一切都在不事张扬的默默孕育中。性格所致,努力所致,严要求高攀越所致。但这一切的落脚点要在语言文字表达上见分晓。也许如此比喻不尽恰当,他有如发射卫星的运载工具般的重要,诚如先哲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虽然文学中的语言文字并非一般工具那么简单,但将它视为一种“大器”,谅是没有疑问的。

读《城市》之余,向更深入的方面推过去,我又想了许多——20余年来,彦林纵横驰骋于诗歌、散文之疆场,连连出手,屡获佳绩。稍早期他的诗歌,在题材和切入角度上均占一席之地,在诗的意蕴上已呈现出鲜明特色。旋即又将笔触转向散文天地(其实他写散文也并非始于此,只是早期尚未充分展开)。这就充分说明,他从任何题材的写作,都是在积蓄相当厚实的前提下灿然生发,而绝非平常之作。我从未见过他空言什么“大散文”之类的口号,但在作品实践上却自然展示出自己独特风格的那种大气。不光是题材大,更重在心路大、领域大、思想空间大,艺术表现上的无偏狭之气,兼容并蓄中的提升力度。我且将一个传统成语改一个字,他这是厚积而“力发”。

它的写作品格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这就是他在某一个创作时段或转换思路之前从不发任何虚妄之语,总是坚持由作品本身说话。他始终在做着坚持不懈的有益探索;也充分相信读者的感受,因此也无意地在读者中收获着有益的验证。这种探索与验证是互动的,从而稳妥而不怠地推动着他那长于创新的笔触,揭示出一页页新的篇章。